

大学书记校长论坛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要用好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加强基础学科培养能力,打破学科专业壁垒,对现有学科专业体系进行调整升级,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加快培养紧缺人才。这为我们加快推进新文科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始终心怀“国之大者”,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立足数字经济时代人才需求,积极推进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商科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加快建设高质量商科教育体系,为服务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服务数字商业发展需求,重塑商科人才培养新理念

近年来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成为稳增长促转型的强力引擎。与此相适应我国数字消费市场规模已达全球第一,催生商业运营模式、管理方式、治理体系等全面加速变革。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要“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数字化驱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变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动力”。面对数字经济时代新形势新要求,传统商科教育专业呈现出单科知识结构、数字思维和技术缺位、课堂教学与商业实践脱节、创新创业思维和实训不足的状况,已无法适应数字商业跨界融合、开放共享和智慧创新的需求,亟需把握新文科建设机遇,转变人才培养理念,重构商科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推进商科教育创新发展。

以价值引领推进铸魂育人。“强化价值引领是新文科建设的根本要求。”高校商科培养的是未来商业领域的主导力量,面对新使命新要求,加快培养数字经济时代新型商科人才,最重要的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



黄先开

的文科教育发展之路”,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牢记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思政课程、课程思政同向发力,引导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筑牢深厚的家国情怀,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市场经济道德意识与社会责任感的教育融入商科人才培养全过程,塑造数字经济时代公平竞争、互利共赢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培养矢志奉献国家和人民、具备国际视野和创新思维、重视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掌握数字思维和技术,同时具有正确的数字商业价值观和商业伦理的高素质复合型商科人才。

以学生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新科技和产业革命浪潮下,商业环境和运营模式日新月异,直播电商、移动支付、智能消费等新业态不断涌现,跨境电商平台、财务共享服务、智慧仓储物流等新模式新场景应运而生,我国的商贸服务业进入消费升级、互联互通、共享经济的3.0时代,消费方式日益个性化、多元化和国际化。这要求商科人才要具备复合型知识结构、数据决策和创新能力、全球化的商业视野和格局,树立合作共赢的商业理念,养成终身学习的良好品质。因此,需要立足当前和着眼未来,顺应新文科建设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的趋势,坚持以学生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落实“三全育人”“五育并举”,

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一体贯通,激发和释放学生的创造性潜力,探索实现个性化培养和因材施教,强化跨文化沟通交流和协作能力,提升数字商业思维和技能素养,培养数字经济形态下政治立场坚定、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和数字素养的复合型创新型商科人才。

以融合创新推动商科人才培养。新文科建设既要固本正源,又要精于求变。“在传承中创新是文科教育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商科作为新文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聚焦培养服务数字经济发展德才兼备的新型商科人才,需要适应消费升级、扩大内需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大力转变教育教学理念,紧密结合我国丰富的商业实践,推进学科融合、产教融合、科教融合,在培养目标定位、内容体系重构、课程数字化转型、师资队伍建设、产教协同育人等人才培养关键领域,推进系统性变革和整体性重塑,构建更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数字技术变革和商业演进趋势的商科人才培养体系。

坚持数字赋能提质升级,创新商科人才培养新模式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推进教育数字化”,这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

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同时随着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商业消费领域的广泛渗透和应用,在科技赋能和消费升级的双重推动下,商业新模式、新场景和新业态不断涌现,要求必须主动超前布局、有力应对变局,奋力开拓新局,把握好新文科建设“专业优化、课程提质、模式创新”三大重要抓手,深入推进商科教育数字化转型,全方位构建面向数字时代的深度交叉融合的人才培养新模式。

数字赋能推动优化商科本科专业。学科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基础平台。面对快速变化的新型商业环境和数字消费业态,迫切需要高校优化调整现有学科专业结构,整体推进商科人才思维、知识、能力和素养的数字化转型升级。这既包括赋予现有商科专业新内容,将数据科学、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融入商科课程体系之中,实现深度融合和赋能改造,更要对传统商科专业进行学科重组交叉,打通理工、经管和人文学科之间的壁垒,对接现代商业服务业和产业链,构建“数字技术+商科”学科专业集群,设立数字经济、金融科技、智能商务、数字法学、大数据管理与运用等跨界融合学科专业,为学生提供综合性跨学科教育,形成商业、科技和人文深度交叉融合的知识 and 能力结构,以适应数据驱动、科技引领的数字时代商贸服务业发展需求。

搭建平台推进跨学科培养。课程

是人才培养最基础最关键要素。通过增强跨界融合意识,整体规划设计面向数字时代的商科课程体系,开设跨学科跨专业新兴交叉课程、实践教学课程,推动打破学科专业壁垒,协同共享校内外优质资源,打造新商科“金课”,培养学生跨领域知识融通能力和实践能力。同时,建设数字技术支撑的学科交叉教育教学平台,搭建创设新型仿真商业环境和应用场景,根据数字商业流程打造模块化课程体系,拓展国际化视野和实现动态调整组合,以解决问题为导向、支持服务学生跨学科学习,促进师生和学生之间合作交流研讨,推动跨学院、跨门类的师资联合授课,校企合作建立跨领域的高水平“双师型”师资队伍,引领带动商科专业建设水平整体提升。

实施精准有效教学质量评估。顺应商业数智化、网络化发展趋势,可以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精准开展学情分析和教学质量评估,从而促进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式学习,有效提升商科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在教学方式方法上,通过丰富的数字教学资源 and 多样化教学方式,打造线上、线下、混合式、虚拟仿真、社会实践等多种类型的课程,开展协作式、体验式、探究式、项目式等特色化教学,为个性化学习、跨领域学习、终身学习奠定坚实基础,构建起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的新商科教学模式。

深化政产学研融通创新,搭建商科人才培养新机制

商科是新文科中实践性较强的应用性学科,并且随着科技迭代升级驱动商业不断快速变革。因此,商科人才培养中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尤为重要。依据市场和行业发展需求,构建政产学研融合的多样化协同育人机制和平台,强化商业实践应用型创新型人才培养,是大势所趋和未来自向。

构建政产学研用全链条育人机制。基于新文科理念和发展趋势,推进高校与政府、企业共生共融,面向经济社会发展新需求,积极融入地方和国家发展新格局,主动引入社会和行业优质资源,以服务新兴商业模式发展和人才市场需求为导向,探索共同申报新兴商科专业,共建未来产业学院或联合办学,培养更多符合时代需求的高素质商科人才,助力数字政府建设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实现多方同步提升共赢发展。

整合共享校企资源搭建实训平台。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促进校企合作和校际联合,实现学科优势互补,重视与相关领域龙头企业合作开设实践课程,构建新商科仿真实践教学实训平台,加强实践实训、案例教学等,建立“学、练、赛、训、创”有机融合实践育人模式。邀请业界专家、企业精英进课堂讲授实务课程和热点专题,鼓励教师走进企业挂职任职,大力建设“双师型”师资队伍,开设企业移动或线上课堂,组织参观见习和访谈讲座等,依托实践基地开展多种形式实践实训教学。

优化完善校内外创新创业协同机制。采用设立多元化校企合作平台、打造沉浸式实训项目等举措,校企多方合作协同建立校内外一体化创新创业区,形成“高校+创业孵化基地+企业”的合作模式,着重培养数字化商业环境下的创新创业精神、意识和能力。聚焦数字商业消费新形态,合作共建研发中心,联合开展项目合作,建立数字经济形态下新型商科人才联合培养机制,推动师生“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作者系北京工商大学党委书记)



张恒

北宋初勃兴的书院至北宋后期渐趋沉寂,至有“至崇宁末乃尽废”之说。宋室南渡后书院再兴,朱熹于此功不可没。朱熹毕生致力复兴书院,创建、复建、扩建及读书、讲学、到访书院60余所,培养生徒400余人,“四大书院”半数因其扬名。纵观古代教育史,“能有如此众多的书院与己有关,朱熹可以说是第一人”。

朱熹有功于书院,不仅在硬件建设,更在于软件建设:其所制定的学规作为典范推广全国并延及后世,其所大倡的会讲成为书院讲学与学术争鸣的重要方式。朱熹复兴了书院,书院也成就了朱熹,他在数十年书院活动中完成了一生多数著述,理学思想不断成熟,终成集理学大成的一代宗师。

创办书院,“播理学火种”

朱熹一生著述达2000万字,“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尤其是其集大成的理学体系,不仅深刻影响中国数百年,亦延及海外。朱子理学萌芽于其少时就读的南溪、星溪、环溪、屏山、云根、湛庐诸书院,而其体系化则主要发生于其所创建、修复的书院,尤其是亲手创办的闽北4座书院。

乾道六年(1170年),40岁的朱熹在建宁府建阳县后山龙湖之阳(今属福建南平)母亲墓侧建寒泉精舍,守墓的同时治学讲学,蔡元定等20余人从学。此间,朱熹钩沉早期理学家行实,编撰《伊洛渊源录》,建构起以周敦颐为源头、二程为中心、张载为补充的早期理学谱系;与吕祖谦合作,分主题汇集早期理学家语录,编成《近思录》;还撰成《太极图图解》《西铭解》等文。

寒泉精舍建起当年,朱熹路过附近云谷山,见其“峰峦特秀”,遂委托蔡元定在此搭建草堂。淳熙二年(1175年),晦庵草堂建成,蔡元定、刘焯等曾学于此。其间,朱熹与弟子登云谷山,遇雨淋湿,心生感怀,想起张载名篇《西铭》名句“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遂各自解读,后朱熹撰成《西铭解》。当



时蔡元定还在附近建西山精舍,与晦庵草堂呼应,悬灯为号、次日切磋。草堂元季倾圮,明代曾重建为云谷书院。

淳熙十年(1183年),因弹劾唐仲友受挫而归居武夷的朱熹,在武夷山五曲隐屏峰下建起武夷精舍,也就是今天的朱熹园。韩元吉《武夷精舍记》称“讲书肄业,琴歌酒赋,莫不在是”。一时学者云集,最多时有蔡元定、黄幹等百数十人。朱熹在武夷精舍完成《四书章句集注》并于绍熙元年(1190年)刊布,这是朱子理学集大成之作,也是以理学解读儒家元典的里程碑之作,元代以后成为科举考试指定教材。

绍熙三年(1192年),迁居建阳童游的朱熹在考亭建竹林精舍,聚徒讲学。两年后,扩建改名沧洲精舍。曾先后从学于寒泉、晦庵、武夷的蔡元定、黄幹等人又聚学于此,形成理学史上著名的考亭学派。此间,朱熹完成《孟子要略》《韩文考异》《楚辞集注》《仪礼经传通解》等撰著。淳祐四年(1244年),宋理宗御书赐额“考亭书院”。

有学者认为,朱熹在其亲手创办的4座书院“从事教学前后达数十年,时间最长,著述最丰富,及门弟子最多”。此外,朱熹还在各地任上复建、扩建多所书院,如淳熙六年

(1179年)在知南康军任上复建白鹿洞书院,绍熙五年(1194年)在荆湖南路安抚使任上重修扩建岳麓书院,同年在原址重建湘西精舍。

制定学规,“尽为学之方”

朱熹复兴书院文化之功,不仅在于创办、修复等硬件建设,还在于理念、制度等软件建设,其所制定的学规、教谕等不仅成为南宋书院之典范,而且成为接下来几个朝代发展教育的纲领性文件。

复建并执教白鹿洞书院期间,朱熹忧于以往“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的学风,“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以下简称《揭示》)。《揭示》提出,教学之旨在于实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五教之目”,并进一步提出“为学之序”在于“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修身之要”在于“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在于“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在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揭示》以其宏旨微蕴引发广泛关注,朱熹弟子刘焯任国子司业时上奏

朝廷,“请刊行所注《学》《庸》《语》《孟》,以备劝讲,及《白鹿洞规》示太学”。淳祐元年(1241年),宋理宗视察太学,亲书《揭示》赐诸生,令天下学校、书院遵行。淳祐六年(1246年)又诏颁《揭示》于各州府县立石,《揭示》遂成全国性学规、教规。朱熹部分弟子及当时不少学者以《揭示》为范本,兴教办学时直接效法或参考借鉴。朱熹晚年重修并讲学于岳麓书院时,也曾将《揭示》应用于岳麓书院的教学与管理,名为《朱子书院教条》,使岳麓书院有了正式学规,对书院的规范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岳麓书院后跻身古代“四大书院”。《揭示》亦影响元、明、清几朝乃至海外,成为数百年间书院学规范本与教育办学纲领。王阳明对《揭示》评价极高,认为“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除白鹿洞书院学规外,朱熹后来创建主持沧洲精舍(考亭书院)时还作《沧洲精舍谕学者》《又谕学者》诸文,强调“立志”的重要性,所谓“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无著力处”,认为“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作贵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朱熹主张,以二三年为期,正襟危坐,将《大学》《论语》《中庸》《孟子》《诗》《书》《礼记》及二程、张载诸位学者之书分明易晓处,反复读之,更就自己身心上存养玩索,著实行履,如此便能有切实的入手之处。

大兴会讲,“道明而德进”

南宋理学发展至集大成阶段,高度思辨化的理论迫切要求各种争鸣辩论,“会讲”于是兴起。当时较早、较知名的几场会讲如“朱张会讲”等皆与朱熹有关,大都发生于朱熹修建或讲学的书院之中。

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应岳麓书院主教师张栻之邀,从福建崇安远赴湖南潭州(今长沙)。在两个多月时间里,朱张二人围绕“太极”“仁”“中和”等重要哲学概念以及“已发”与“未发”“察识”与“涵养”“心”与“性”“情”等重要哲学问题展开了相

当广泛的讨论。“朱张会讲”不仅聚集起书院师生,而且吸引了各地学子,盛况空前,“马饮则池水立涸,輿止则冠冕塞途”,长沙至今还有“饮马塘”“朱张渡”等地名。

“朱张会讲”促进了朱熹与张栻两位理学大家思想的成熟。张栻《诗送元晦尊兄》云“遗经得细绎,心事两绸缪。超然会太极,眼底全无牛”,言二人的讨论已到庖丁解牛、超然无物之境。朱熹答诗称“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始知太极蕴,要眇难名论”,言其对太极等的理解又深一层。“朱张会讲”后岳麓书院名声更噪,诚如元代理学家吴澄所言,“自此之后,岳麓之为书院,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后朱熹任荆湖南路安抚使时又重修扩建岳麓书院,“规模宏阔,教条详明,一时湖南道化之盛,至比邹鲁”,岳麓书院后跻身古代“四大书院”。

除“朱张会讲”,朱熹还与陆九渊等人在江西有过“鹅湖之会”。早在寒泉精舍时期,朱熹就曾与吕祖谦相会于建阳并合编《近思录》,二人的“寒泉之会”被视为“鹅湖之会的前奏”。淳熙二年(1175年),由吕祖谦邀集,朱熹、吕祖谦与陆九龄、陆九渊兄弟相会于江西信州鹅湖寺(今属江西上饶),史称“鹅湖之会”,就为学之方等问题展开激烈辩论,最后不欢而散。后人在“鹅湖之会”处建鹅湖书院,成为重要地标。淳熙八年(1181年),陆九渊应邀前往朱熹主持的白鹿洞书院讲学,也是一次重要会讲。朱陆讨论了“义利之辨”等问题,陆九渊留下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朱熹刻石立于书院并亲自作跋。

朱熹《论语集注》言,“讲学以会友,则道益明;取善以辅仁,则德日进”,朱熹在各地书院主持、参与会讲,大大繁荣了南宋书院文化,推动了学术争鸣论辩,理学也在一次次会讲中成熟完善,终至集大成之境。

